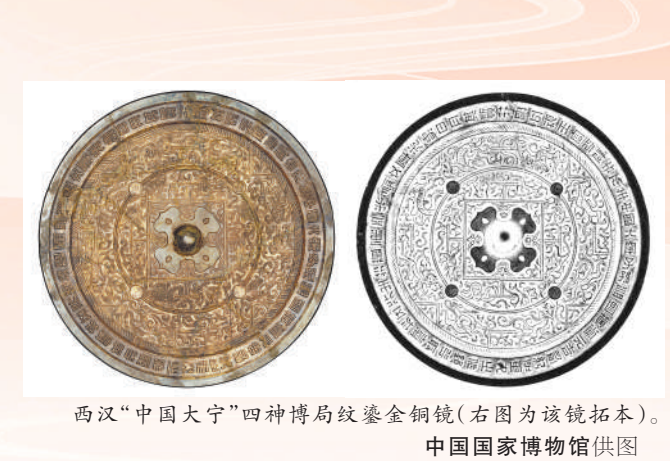


这面铜镜刻着2000年前的祝愿——

“中国大宁 子孙益昌”



西汉“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右图为该镜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

这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一面西汉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以下简称“中国大宁镜”)上的部分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说出了从古至今华夏儿女的共同心愿。

1951—1952年，它被发现于湖南长沙城北的伍家岭211号西汉墓，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

这面鎏金铜镜，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根据镜背纹饰与设计风格，中国大宁镜应该铸造于南方地区，具体而言，有可能是长沙一带。目前，长沙地区汉墓出土博局纹鎏金铜镜数量相对较多，如杨家山304号西汉墓、黑槽门2号东汉墓均有出土。此外，1958年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也出土了一面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

汉代产生“中国大宁”这类铜镜铭文有其必然性。这一时期，“家国同构”的天下观已

青铜不语，铭文作史。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迷盘静卧于展柜之中，光泽温润，恍若初铸之时。古人称青铜为“吉金”，吉金初成，灿若黄金，是礼敬天地、昭告先祖的神圣之色。3000年月月流转，它不曾褪去这份庄严。

3000年前，它曾盛水盥洗，是宗庙祭祀中的礼器。3000年后，当考古工作者轻轻拂去黄土，它腹底那370余字铭文重见天日。器主单逯，以盘为纸，书写了一个家族八代人的忠诚，也书写了一个王朝12位王的兴替历程。

这件青铜器铸于西周宣王时期，2003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铭文以单氏八代为主线：皇高祖单公辅佐文王、武王兴周灭商；公叔、新室仲辅佐成王、康王开拓疆土；惠仲、懿父辅佐昭王讨伐楚荆、穆王征伐四方；零伯、懿仲、襄叔等相继辅佐共王至厉王；至单逯本人，又效力于当时在位的宣王。铭文既记征战，也记理政，还记管治林泽，构成一幅西周国家治理的长卷。

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材料”。迷盘正是这样的典型：其铭文与传世文献互证，使西周历史更清晰可信。迷盘铭文系统排列12位天子，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王世基本吻合，为西周年代学、家族史与礼制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为解决史学界关于西周王世和重要历史事件的长期争议提供了坚实支撑。正因如此，它被学界誉为“青铜史书”和“中华第一盘”。

迷盘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出土文献的形式，揭示了“家国同构”的文明基因。西周宗法制度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单氏家族以世代忠勤获得封赏与荣宠，周王朝也依靠世卿士族的辅佐维系治理。铭文中，单逯反复称颂祖先功德，也反复感念周王嘉勉。家族的荣辱，系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也牵动家族的命运。这种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寄于一体的观念，正是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重要基础。从西周的宗法秩序，到孔孟的仁政理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舍家为国，到新时代的奋斗奉献，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它让个人不迷失于小我，让家庭不封闭于私利，让国家成为亿万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是凝聚民族共识、激发奋斗精神的力量源泉。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把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发展的进程，这正是迷盘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

(作者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

迷盘静卧于展柜之中，光泽温润，恍若初铸之时。古人称青铜为“吉金”，吉金初成，灿若黄金，是礼敬天地、昭告先祖的神圣之色。3000年月月流转，它不曾褪去这份庄严。

3000年前，它曾盛水盥洗，是宗庙祭祀中的礼器。3000年后，当考古工作者轻轻拂去黄土，它腹底那370余字铭文重见天日。器主单逯，以盘为纸，书写了一个家族八代人的忠诚，也书写了一个王朝12位王的兴替历程。

这件青铜器铸于西周宣王时期，2003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铭文以单氏八代为主线：皇高祖单公辅佐文王、武王兴周灭商；公叔、新室仲辅佐成王、康王开拓疆土；惠仲、懿父辅佐昭王讨伐楚荆、穆王征伐四方；零伯、懿仲、襄叔等相继辅佐共王至厉王；至单逯本人，又效力于当时在位的宣王。铭文既记征战，也记理政，还记管治林泽，构成一幅西周国家治理的长卷。

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材料”。迷盘正是这样的典型：其铭文与传世文献互证，使西周历史更清晰可信。迷盘铭文系统排列12位天子，与《史记·周本纪》所载王世基本吻合，为西周年代学、家族史与礼制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为解决史学界关于西周王世和重要历史事件的长期争议提供了坚实支撑。正因如此，它被学界誉为“青铜史书”和“中华第一盘”。

迷盘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出土文献的形式，揭示了“家国同构”的文明基因。西周宗法制度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单氏家族以世代忠勤获得封赏与荣宠，周王朝也依靠世卿士族的辅佐维系治理。铭文中，单逯反复称颂祖先功德，也反复感念周王嘉勉。家族的荣辱，系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也牵动家族的命运。这种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寄于一体的观念，正是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重要基础。从西周的宗法秩序，到孔孟的仁政理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舍家为国，到新时代的奋斗奉献，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它让个人不迷失于小我，让家庭不封闭于私利，让国家成为亿万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是凝聚民族共识、激发奋斗精神的力量源泉。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把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发展的进程，这正是迷盘给予我们的当代启示。

(作者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迷盘。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

迷盘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出土文献的形式，揭示了“家国同构”的文明基因。西周宗法制度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单氏家族以世代忠勤获得封赏与荣宠，周王朝也依靠世卿士族的辅佐维系治理。铭文中，单逯反复称颂祖先功德，也反复感念周王嘉勉。家族的荣辱，系于国家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也牵动家族的命运。这种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寄于一体的观念，正是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重要基础。从西周的宗法秩序，到孔孟的仁政理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舍家为国，到新时代的奋斗奉献，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它让个人不迷失于小我，让家庭不封闭于私利，让国家成为亿万人民的命运共同体。

深入人心，民众普遍期盼王朝安宁、子孙昌盛，并将祈愿铭刻在日常所用铜镜上，“中国大宁”这样的镜铭词语由此从长沙地区扩展到东边边地。

中原北方地区出土汉代博局纹鎏金铜镜则较罕见，目前仅有一面新莽时期的泰言四神博局纹镜，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纹饰风格规整、严谨，铭文格式遵守一定范式。中规中矩、不逾法度是大多数博局纹镜设计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而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镜铭文内容别具一格，纹饰设计自由、灵活，想象力丰富，甚至还出现了打破内区与外区分界线的设计手法，将动物形象的头部置于内区，身躯则位于外区。这种“跨界”构图的现象，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博局纹镜上从未见到过。

制作一面精美的铜镜，一般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铜水、镜体脱范、打磨成型等多道工序。中国大宁镜除了上述工序，还多了一项特殊的鎏金工艺——将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汞蒸发后，金就留在了器物表面。这样一面金光闪闪的铜镜，加上奇异、鲜活的四神形象和其他动物纹饰，以及接近镜缘处环绕一周的52字篆书体铭文，自然会得到主人的珍爱。它或许伴随主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主人逝去，宝镜埋葬，直到约2000年后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镜主人的墓为竖穴土圹墓，墓室南北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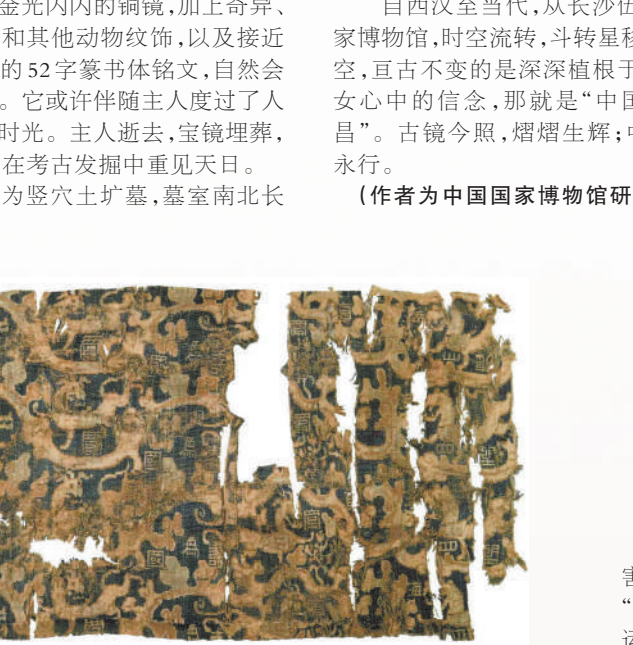
6.9米、东西宽5.2米。在墓室西北棺椁范围内，考古学者小心翼翼清理出一个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中国大宁镜就安置其中。在漆奁外北侧还发现一面四乳四虺镜，在棺椁范围的南侧另有一面铜华连弧镜，均为一般工艺镜。通过3面铜镜的位置及有无盛放器具，可知中国大宁镜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随葬品中，还有一件金饼。从墓的地理位置以及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推测可能是西汉后期长沙国官吏夫妇合葬墓。

2017年，国博举办“秦汉文明展”，展览开始部分陈列的是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结尾处则用一个独立展柜突出了这面中国大宁镜。为什么一面直径只有18.6厘米的小镜子，要放在展览末端的重要位置呢？它的特殊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纹饰构图独特，二是鎏金工艺少见，最重要的，就是镜铭“中国大宁”4个字容易和现场观众产生强烈共鸣。2020年国博举办“瑞彩平安——2020新春展”，作为重点展品之一，中国大宁镜陈列于显要位置；2025年“清风万里——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此镜亦被放置于尾厅，和“海晏河清”瓷尊一起收束全展。由此可见它的重要地位。

自西汉至当代，从长沙伍家岭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空流转，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时空，亘古不变的是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古镜今照，熠熠生辉；中国大宁，大道永行。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楼兰故城孤台墓地出土“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刘大玮供图

云气流转，瑞兽奔腾。宝蓝色的锦面上，“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九个隶书大字穿行于云气瑞兽之间。历经近2000年岁月，丝缕虽已不复当年的光泽，字里行间寄托的家国祈愿，依然清晰可辨。

这件“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出土于楼兰故城附近的孤台墓地，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0年3月至4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楼兰考古队，对楼兰故城及其周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在故城东北方向一处孤立高台上，考古人员对其两座墓葬进行了清理，这件织锦便出土于编号为MB2的墓葬。一同出土的，还有漆器、铜镜、五铢钱等文物。考古人员选取相邻墓葬葬具的朽木进行碳十四测定，再结合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将织锦定为东汉时期遗物。

织锦右侧边缘已经残缺，现存文字为“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古代织锦上的文字常随纹样循环排列，其断句和释读，需要结合织物结构及同类文物加以判断。参照其他同类纹样织锦上的文字，研究人员认为其完整文字应为“登高明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

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古代所谓“国庆”，一般指国家的喜庆之事，并非今天作为国家成立纪念日的国庆节。传世文献中，西晋陆机《五等诸侯论》就有“国庆独殚其利，主忧莫与其



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杭字册。谢冬荣供图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重要的收藏之一。“盛世修典”，大型典籍对文脉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永乐大典》尤为特殊——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编排方式也最特别；其坎坷的命运，更令人感慨。

一般类书，都是按内容类别编排，《永乐大典》却采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先按《洪武正韵》收录的单字排序，再把各书中与这个字相关的内容广泛辑录下来，整句、整段甚至整本书抄录，系在该字之下。

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刚开始编纂时，明成祖朱棣就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六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据估算，它收录图书



“国庆”二字，承载着中华民族深沉的集体情感。从约5000年前的彩陶纹饰，到汉代铜镜、织锦上的“中国大宁”“为国庆”；从以礼乐制度奠定中华文明根基的西周青铜器，到以文运映射国运的明代典籍，本版汇集了5件珍贵文物，它们共同诉说着对家国安宁、盛世长存的新愿。请读者朋友与我们一起，接收这份跨越时空的祝福。

——编者

害”之句。从内容看，“望四海”有登高远望、纵览四方之意，“贵富寿”寄托着对富贵长寿的向往，“为国庆”则表达了对国运昌隆的祝愿。个人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四海安宁、国家兴盛的期盼，在短短数语中融为一体。

锦面以云气纹组织画面，连绵起伏的云气局部层叠如山，其间织有禽鸟、飞龙、独角兽、双角兽和翼兽等动物形象。它们或昂首前行，或振翼欲飞，与隶书文字相互穿插，使有限的锦面呈现出开阔流动的气象。云气动物纹是汉代丝织品上常见的装饰题材。古人以云气贯通画面，将现实中的禽鸟、传说中的瑞兽和吉祥文字织在一起，寄托趋吉纳福、富贵长寿的愿望。其中的有翼动物形象源于西亚。汉代织锦的构图和文字传统，与沿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艺术因素在此相遇，凝结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画面。

这样的相遇并非偶然。楼兰地处罗布泊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使者、商旅和各类人群往来不绝。丝绸质地轻柔，便于携带，又具有较高价值，因而成为丝绸之路上极具代表性的物品。它所传递的不只是色彩和纹样，还有织造技术、文字书体、审美观念和生活愿望。一根根丝线连接起相隔数千里的地域，一幅幅纹样留下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

今天，当人们站在展柜前凝望这件东汉织锦，看到的不只是“国庆”两个熟悉的汉字。云气瑞兽之间，有汉代织工的精巧技艺，有丝绸之路上的往来交流，也有古人对生活美满、国家安宁的深切期盼。古今“国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经纬之间的家国祈愿，却穿越漫长岁月，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写”在丝路织锦上的“国庆”

刘大玮

害”之句。从内容看，“望四海”有登高远望、纵览四方之意，“贵富寿”寄托着对富贵长寿的向往，“为国庆”则表达了对国运昌隆的祝愿。个人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四海安宁、国家兴盛的期盼，在短短数语中融为一体。

锦面以云气纹组织画面，连绵起伏的云气局部层叠如山，其间织有禽鸟、飞龙、独角兽、双角兽和翼兽等动物形象。它们或昂首前行，或振翼欲飞，与隶书文字相互穿插，使有限的锦面呈现出开阔流动的气象。云气动物纹是汉代丝织品上常见的装饰题材。古人以云气贯通画面，将现实中的禽鸟、传说中的瑞兽和吉祥文字织在一起，寄托趋吉纳福、富贵长寿的愿望。其中的有翼动物形象源于西亚。汉代织锦的构图和文字传统，与沿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艺术因素在此相遇，凝结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画面。

这样的相遇并非偶然。楼兰地处罗布泊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使者、商旅和各类人群往来不绝。丝绸质地轻柔，便于携带，又具有较高价值，因而成为丝绸之路上极具代表性的物品。它所传递的不只是色彩和纹样，还有织造技术、文字书体、审美观念和生活愿望。一根根丝线连接起相隔数千里的地域，一幅幅纹样留下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印记。

今天，当人们站在展柜前凝望这件东汉织锦，看到的不只是“国庆”两个熟悉的汉字。云气瑞兽之间，有汉代织工的精巧技艺，有丝绸之路上的往来交流，也有古人对生活美满、国家安宁的深切期盼。古今“国庆”，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经纬之间的家国祈愿，却穿越漫长岁月，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害”之句。从内容看，“望四海”有登高远望、纵览四方之意，“贵富寿”寄托着对富贵长寿的向往，“为国庆”则表达了对国运昌隆的祝愿。个人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四海安宁、国家兴盛的期盼，在短短数语中融为一体。

《永乐大典》盛世护典 赓续文脉

谢冬荣

达七八千种，几乎涵盖了明初以前所有重要典籍。不少书后来亡佚了，正是靠《永乐大典》才保存下来。

工作量之巨大，可想而知。从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编纂，到永乐六年(1408年)大功告成，2000多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全书共有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它初名《文献大成》，后来，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修成后，因卷帙浩繁，只誊录了一部，是为“永乐正本”。嘉靖皇帝非常喜欢，案头时不时放几册。由于宫中多次发生火灾，他担心《永乐大典》的安全，便决定依照原样，重新抄录一部。为此，朝廷专门举办考试，选拔擅长书法之人，共录用109人；为确保质量，还规定誊录人员每天限抄三叶。到隆庆元年(1567年)，抄录完成。这一重录本，一般被称为“嘉靖副本”。

《永乐大典》命运多舛。永乐正本在清初便已不知所终，现在一般认为极可能毁于明末战火。嘉靖副本原藏于皇史宬，清雍正时迁至翰林院敬一亭收藏。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曾清点《永乐大典》，发现已遗失1000多册。此后，由于管理不善，《永乐大典》陆续被盗，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剩800多册。庚子事变时，翰林院成为交战之地，所藏《永乐大典》大部被毁，部分被外国士兵乘机窃取，只有300多册保留下来。这些书后来又陆续散失，至宣统年间，翰林院留存的《永乐大典》仅有64册。

据统计，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400多册，散藏在8个国家、30多个藏书机构和个人手中。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数量最多，百余年来，经过拨交、捐赠、购买等途径，所藏《永乐大典》达224册。

其中，杭字册是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所捐赠。它的背后，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杭”字在《永乐大典》中共54卷，主要内容是“杭州府”，现仅存卷7602—7603这一册。卷7602所引之书为《武林旧事》，内容包括湖山胜概、歌馆、食具等。卷7603所引之书包括《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咸淳临安志》《杭州府志》等，主要记载“钱塘”一地各方面的历史。

《西湖老人繁胜录》此前未见传本存世，是一部久已亡佚的珍贵典籍。书中记载了南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的花瓣纹庙底沟彩陶。王仁湘供图

庙底沟彩陶中的纹样非常丰富，其中以花瓣纹特点突出，引人注目。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指出，“华”字古义为“花”，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瓣纹，可能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

庙底沟彩陶中，四瓣式花瓣纹数量很多，较为典型，也有一些多瓣式的花瓣纹。这两种花瓣纹构图都非常严谨，画工大多也十分精致，是仰韶文化彩陶具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

四瓣式花瓣纹一般是二方连续式结构，构图左右对称，可以看作是4个叶片的向心组合形式，其衬底纹饰为4个弧边三角纹。4个弧边三角纹合围，就是一个严谨的四瓣式花瓣纹单元。上下两瓣花瓣之间，往往留有明显的空白带。

多瓣式花瓣纹更复杂。多瓣式花瓣纹彩陶豫西和晋南出土较多，在外围文化中则以鲁南苏北发现较多，向南的分布已到达长江南北。就其类型来看，也是豫西和晋南地区发现的最齐全，有四六、五五、五六瓣的复合式。

多瓣式花瓣纹应是由四瓣式花瓣纹变化而来，是四瓣式的一种扩展形式。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一件曲腹彩陶盆，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五瓣复合式，这也是庙底沟文化中仅见的一件标准五五瓣式花瓣纹。将纹饰拆解开，不难发现，它的基础构成是内敛的四瓣花，中间加绘有一叶片。上面一列正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下面也是一列四瓣花。上下两列花瓣用错位重叠的方法结合起来，上列纹饰下方的两个花瓣同时也是下列纹饰上方的花瓣。整体看来，我们感觉到的是一正一倒的五瓣花结构形式，构图严谨，让人甚至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另一件曲腹彩陶盆，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六瓣复合式。将纹饰拆解后，它的基础构成也是内敛的四瓣花，中间加绘有一叶片。上面一列也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下面有一列略显变形的四瓣花。上下两列花瓣平行重叠，在结合部又绘成一个四瓣花。整体来看，纹饰带的主体是六瓣花结构，每两朵六瓣花之间形成了一个倒置的五瓣花，同样让人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

出自山西汾阳段家庄遗址的一件彩陶盆纹饰变化较大，为五六瓣复合式花瓣纹。它可以拆解为上中下三层交叠的四瓣花，花瓣叶片变得细且长，四瓣花中间绘双点穿圆图形。将上下连接的两个圆形也看作是花瓣，与重叠的四瓣花一起，就构成了六瓣花。在六瓣花之间，形成了两个上下对顶的五瓣花，构图极富巧思。

当然，不论是四瓣式还是多瓣式，彩陶上的这类花瓣纹并不是对真正花瓣的写实或图案化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花瓣纹，其实与自然界的花瓣并不相干，真可谓“似花还似非花”。但彩陶花瓣纹想表达的，一定是某种令人心花怒放的意境，也一定包含着对那个鲜花盛开的美好世界的向往。

基于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我绘制了鱼纹、叶片纹、花瓣纹等庙底沟文化彩陶典型纹饰的空间区域分布图，由此可以了解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的范围。特征非常突出的四瓣式花瓣纹彩陶，分布中心在关中及附近地区，东到苏北，西及甘青，扩张到鄂北直至江南一带。这样一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区域，由此体现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大范围文化认同。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中国史前时期出现的一次大规模艺术浪潮，这个浪潮所奠定的艺术传统，无疑也影响到后来古代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发展。



宋时期杭州的风俗、饮食等，当时酒类名目繁多，有思堂春、珍珠泉、琼花露等，还出现了不少如今耳熟能详的食物，如馄饨、羊泡饭；记中秋钱塘江观潮赏月情景，“江岸暮次相连，轿马无顿处……是夜，城中多赏月排会，天气热宿湖饮酒，待银蟾出海，到夜深船静，如在广寒宫内。”

杭字册1914年出现在市面上，经历一番波折，最终被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先生购得。鉴于《西湖老人繁胜录》《永乐大典》专题展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先生得知此事后，毅然决定将自己收藏的杭字册捐赠国家。他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明确表示：“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在周先生的带动下，金梁、徐伯郊、赵元方等人纷纷将自己所藏的《永乐大典》捐赠国家，一时掀起捐赠《永乐大典》的高潮。第二年，周叔弢先生还将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宋元明善本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盛世修典，修的是前人的智慧；盛世护典，护的是后人的根基。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传承好《永乐大典》，望文脉不绝，国运长盛。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宋时期杭州的风俗、饮食等，当时酒类名目繁多，有思堂春、珍珠泉、琼花露等，还出现了不少如今耳熟能详的食物，如馄饨、羊泡饭；记中秋钱塘江观潮赏月情景，“江岸暮次相连，轿马无顿处……是夜，城中多赏月排会，天气热宿湖饮酒，待银蟾出海，到夜深船静，如在广寒宫内。”

杭字册1914年出现在市面上，经历一番波折，最终被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先生购得。鉴于《西湖老人繁胜录》《永乐大典》专题展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先生得知此事后，毅然决定将自己收藏的杭字册捐赠国家。他在给北京图书馆的信中明确表示：“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在周先生的带动下，金梁、徐伯郊、赵元方等人纷纷将自己所藏的《永乐大典》捐赠国家，一时掀起捐赠《永乐大典》的高潮。第二年，周叔弢先生还将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宋元明善本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盛世修典，修的是前人的智慧；盛世护典，护的是后人的根基。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传承好《永乐大典》，望文脉不绝，国运长盛。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